

兩漢經學史

章叔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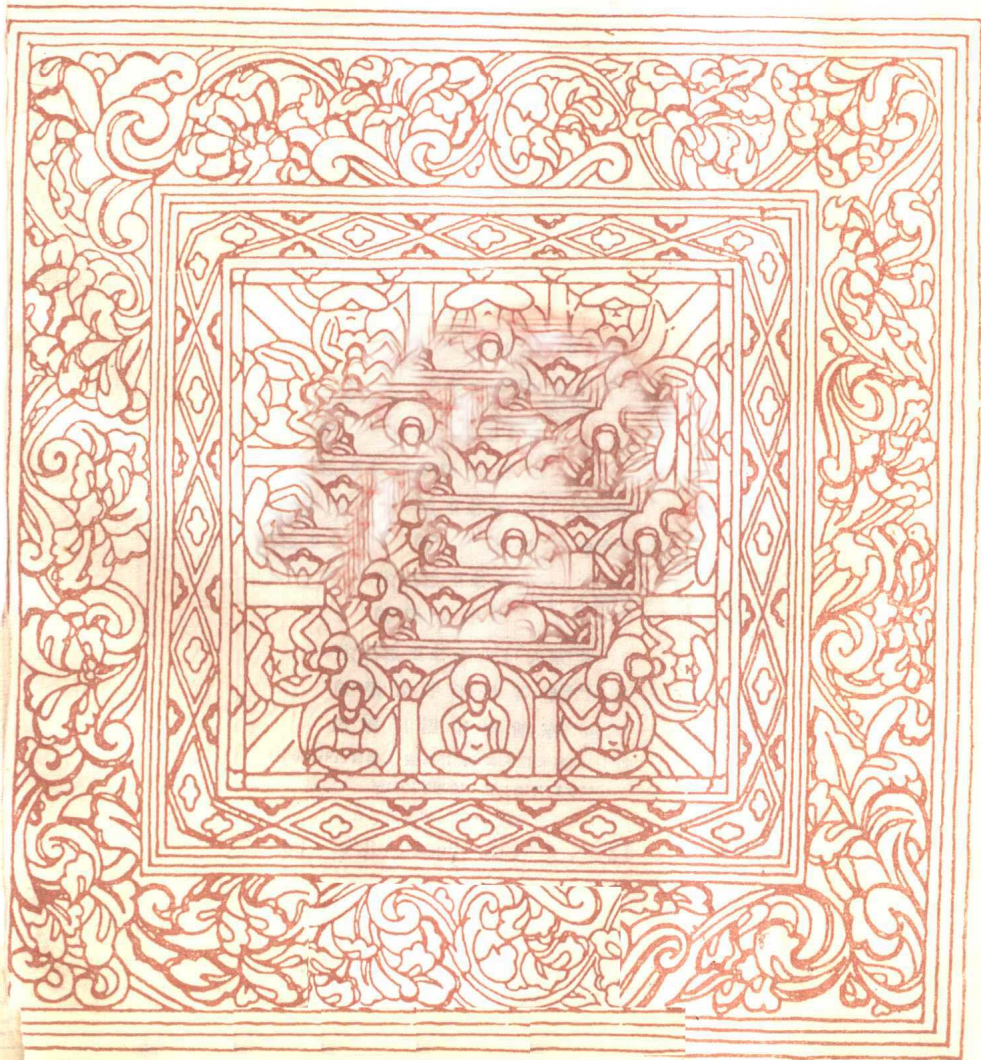


8266

两汉经学史

章 权 才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316

.35

两 汉 经 学 史

章 权 才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375印张 1 插页218,000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册

ISBN 7—218—00816—8/K·69

定价3.35元

序 言

“人之患，在好为人序。”顾炎武的这种主张，我是谨记和赞同的。然而，在我有幸先睹了权才同志的《两汉经学史》后，却不揣简陋地写下了些许感受和心得，则是因为又忆及《日知录》中的另两句话——“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

我之所以敢为门外经谈，对作者和著作略加绍述，就是因为这部专著甚有价值，应当使读者更多地了解其人与其书。

权才同志于一九六一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旋入复旦大学为研究生，受业于周予同先生，专攻中国经学史。十年动乱之始，竟被分配到韶关某工厂。而他于“抓革命，促生产”之余，又始终不能忘情于经学史。这种荒唐的现象显示出社会生活的倒错，却也勾勒出他的“书生”本色。直到一九八二年初调到《学术研究》杂志社后，他才得以重操旧业。只是忙于编辑事务，关于经学史的论文大抵还是以楔而不舍的精神硬“挤”出来的。我与权才同志的结识始于此时，比邻而居给了我很多向他请教的机会。经学史自然常常成为话题，他对专

业的挚爱和宏大的研究方案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确是执着而认真的，业已脱稿的第一分册就是实证。令我自愧弗如，并受到激励和启示。

“重视经学史的研究”——权才同志的呼吁深得我心。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经和经学无疑居于核心地位。它是绵长的中世纪的统治思想，“经”的称谓本身就标志着它的至高的、独尊的属性。两汉以降的经学的嬗递和流变，不过是这种官方哲学的适应性的损益。经学固然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但其能动的反作用则是不可低估的。至于它在意识形态——从哲学、政治学以至礼俗风习——的深远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为了全面深入地认识传统文化和封建社会，必须对经学及其历史进行研究。考虑到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堪称十分薄弱，权才同志的呼吁和实绩当会引起人们的称赞。

当然，经学史的研究是一桩艰巨的任务。研究者不仅要能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在这两个方面，权才同志是胜任的。他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传统文化得窥堂奥。第一分册尽管只是论述了经学的形成和初期的发展，却也包容了作者的许多卓见，显示了作者的功力，成为全部经学史的良好开端。可以预期，本书对于近年来的“文化热”，将会起到推向纵深化的积极作用。归根结蒂，优秀的成果是强有力的动因。

经学史的研究，首先要求作者持有科学的分析态

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赞同作者的下述论断：“‘经’和‘经学’有许多是糟粕，但却非全属糟粕，在构成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不同系列和层次里，无疑包含着孔子的某些思想和经学的某些成分。”因此，我们的任务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这份文化遗产进行剖析，在扬弃的前提下加以吸收和继承，使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构筑因素。任何片面的、绝对化的态度是于事无济的，儒学——经学的命运充分说明了这一道理。笼统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倒”，并不能摒除其消极的方面。而对儒学——经学的夸大溢美，则难免陷于荒诞。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化倾向不能重复，但它的革命的批判的传统必须继承和发扬。当今的社会主义文化既要是民族化的，又要是现代化的，二者不可偏废，不能高扬一点而压低另一点。《两汉经学史》确是力戒偏颇，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和成绩。

我以为本书的另一个优长特点是作者把经学史理解为派别、思潮的相互交替和彼此影响的过程，从学派的分化和流向中作出动态的剖析，而屏除了局囿于对个人及其著作的孤立的研究。当然，主要的代表性人物（如董仲舒等）应当着重论述，但是，每一个思想家都宛如座标——既有纵向的承上启下的关系，又有横向的相互渗透的关系。《两汉经学史》对今古文学的论争的分析，对综合学派的论述，对经学流变中的保守和改革

倾向的评判，都体现了这种无悖于实际的科学方法。应当承认，作到这点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社会科学春天的到来，经学史的研究——如同其它学科一样——也正在深化和拓展。这样，就对经学史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权才同志正当盛年，完全有理由期望他在已有基础上作出更大的贡献。我切盼他的经学史第二、三、四分册早日问世，为繁荣学术和提高民族文化而推出累累硕果！

张 磊

1988年春

于越秀山麓

自序

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这本篇幅既短成果又不足称道的小册子献给读者。

如果说撰写这本小册子的指导思想，其实也很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想通过它，喊出我长期想喊的一句话：请重视中国经学史的研究！

在祖先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中，“经”和历代的“经学”所占的份量本来是不难认识的。例如，在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纂修、经十年努力方告完成的《四库全书》中，“经”和“经学”列于部首。全书总数3503部、79337卷；而“经部”却占了1773部，20427卷。比重如此之大，简帙如此之浩繁，难道还不足以唤起我们投以相应的精力去研究和探索它吗？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

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根据马、恩的教导，我们认为，所谓“经”和“经学”，从本质上说，正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作为时间的界标，这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才正式确立的。此后，历代的“经学”连篇累牍，这其实是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以适应不同时期不同需要的过程。既然如此，要研究二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言而喻，自然也就要研究经和经学。不研究，就等于缺了一条腿，我们总的研究成果也就支撑不起来。

“经”和“经学”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随着历史的推移，范围也不断扩大。六经、五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的称谓相继出现。从内容上看，“经”和“经学”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它包涵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也包涵了文化领域的诸多方面。这种历史现象表明，封建地主阶级着意建立的统治思想是多方面多功能的。但因此也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要研究封建社会精神生产的历史，要探索古代哲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以至民俗学等，也就必然离

不开研究经学史。这难道不也是一清二楚的事实吗？

可是，同样一清二楚的事实是，长时间来我们一直没有一部比较象样的中国经学史。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仅有的几部有关著作：一是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一是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一是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一是日人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这四部书固然都是从史的角度揭示经学流变的，而且各书都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是，总而论之，它们又各自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弱点。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是皮氏晚年的力作，内容精详博大，某些论断也颇有见地。但它毕竟是光绪年间的一部教科书，里头的封建毒素自也不少。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有二册，第一册是简要的经学史，而第二册则专论《易经》的义与例。刘氏经学传家，造诣甚深。此书的优点在于精练概括，缺点则是囿于古文经学的派别之见。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撰期较后，篇幅不长。此书优点在于能够摆脱经学内部的派别之见；缺点是流于叙述，缺乏思想，在使用材料方面也多有错误。另一部《中国经学史》是日本学者的著作，由东京弘文堂出版。此书结构较为详密，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但在材料的使用上，疏于考订，立论也有许多偏颇之处。但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在经学史研究尚待开拓的时候能写出这样一本著作，实属难能可贵。

解放后，面貌略有改观。已经有了一批学者，对经

学中的某些领域着手进行研究。他们或为《易》，或为《书》，或为《诗》，或为《春秋》，攻其一端，成果也日暂增多。但系统地、综合地进行史的研究的，却也寥寥可数。跟史学中的其他领域相较，无论研究人员或研究成果等方面，都显得很不相称。不过，有几位学者值得一提：一位是范文澜先生，一位是周予同先生，一位是蒙文通先生，此外，还有杜国庠、杨向奎、汤志钧等先生。他们都是中国经学史研究的佼佼者，还在解放前，他们就在这片尚待开垦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并取得了一系列卓著成果；解放后，他们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们的远见卓识，无疑值得我们后学者学习、效仿。

过去，不少学者把中国经学史的研究视为畏途。究其原因，一是怕搞不通；二是怕吃力不讨好。后面的原因恐怕还是主要的。有的人把研究经学史跟“尊孔读经”混为一谈，甚至在它们中间划上等号。结果，既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也模糊了人家的视线。其实，研究经学史跟提倡“尊孔读经”完全是两码事，我们大可不必为此出冷汗。再前进一步，我们且认为，对“尊孔读经”也还存在一个如何准确理解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提出反对“尊孔读经”，是跟特定的历史背景相关联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传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破天荒的一件大好事。此时此际，一些封建制度的卫道者们抬出了孔子，捧出了经书，要人们尊孔读经，这当然不对，当然应该受到批判。但是，就是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反对“尊孔读经”，也决不意味着对孔子要全盘否定，对经书要全面烧毁。事实表明，孔子的说教决非句句是精华，但确实有一部分是精华；“经”和“经学”有许多是糟粕，但决非全属糟粕。在构成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不同系列和层次里，无疑包涵着孔子的某些思想和经学中的某些成份。我们这样说，并非唯心主义，恰恰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经学史的研究急待开展。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任务又应作如何规定呢？一九六一年，周予同先生在《经·经学·经学史》一文中提出了如下见解：一、研究“经”的来源和性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如何反映在“经学”范围之内。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各个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如何在“经学”范围内展开思想斗争。二、中国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如何利用“经”和“经学”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上的统治。历代的“经学”思想又如何为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服务。三、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代中，“经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是怎样的。个别经学家的思想为什么不属于统治阶级，甚或利用“经学”进行革命宣传。对这种文化遗产，应该怎样批判吸收。对于周予同先生如上三个方面的规定，我们均表赞同。

话又重新回到开头。读者见到的这部书是一部不太象样的小册子。不过，它是作为《中国经学史》的第一分册出现的。涉及的时间是从先秦到两汉。有了第一册，主

观上也就希望有第二册和其他各册。我打算为此而尽自己绵薄之力。而这个想法，是自一九六一年我考进复旦大学当周予同先生的经学史研究生时就开始萌发了的。只是毕业后经历了“文革”的十年动乱，又下到工厂接受再教育，使这个想法迟迟未能见诸行动。“四人帮”的垮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唤起了我的科研热情。于是，有了这本小册子的问世。在构思、写作和成书过程中，我得到了已故周予同先生的关怀和教诲，得到复旦大学历史系许多教师的鼓励，得到广东省社科院、社科联各位专家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我衷心希望，在今后的科研当中，能继续得到更多学者专家的教诲和帮助，并愿意跟有志于此的同行一道携手并进。谢谢！

目 录

序言.....	张磊 (1)
自序.....	(1)

第一章 先秦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对早期儒家学说的继承和改造.....	(1)
一、春秋后期由孔子创立的在思想体系上具有二重性的早期儒家学派.....	(1)
二、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与早期儒家学派的分裂.....	(17)
三、战国后期以荀子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对早期儒学的继承和改造.....	(81)
四、焚书坑儒——秦始皇在确立新兴地主阶级统治思想历史进程中的功过是非.....	(49)
第二章 西汉前期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巩固与作为统治思想的经学的出现.....	(61)
一、西汉初期的无为而治与儒学复兴.....	(61)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统治思想的“经学”的出现.....	(70)
三、具有约束力的早期经学先师的师法.....	(80)
四、石渠经学讨论会与汉宣帝的称制临决.....	(91)

第三章 反映汉初中小地主阶层利益的董仲舒的

- 《春秋公羊》学 (100)
- 一、董仲舒生卒年及其主要著述 (100)
- 二、董仲舒的社会出身和思想渊源 (107)
- 三、《春秋繁露》对《春秋公羊》理论的
继承和发展 (112)
- 四、董仲舒“天人相与”思想的社会意义 (119)
- 五、具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德政”思想 (138)
- 六、以反兼并为中心的维护中小地主利益的
经济理论 (144)
- 七、以“罪同异论”为主要原则的刑罚思想 (152)
- 八、董仲舒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162)

第四章 西汉后期世家豪族势力的发展与古文学

- 的兴起 (166)
- 一、西汉后期世家豪族势力的发展 (166)
- 二、传统经学的分化与经义中保守倾向的加
强 (169)
- 三、古文学的兴起及其保守的理论体系 (174)
- 四、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与经今古文学的
第一次论争 (179)
- 五、《左传》的义例与“君子曰” (184)
- 六、《周礼》与王莽的复古改制 (190)

第五章 东汉前期反映地主阶级保守倾向的白虎

- 观学会议 (202)
- 一、以地方豪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东汉政权
及初期对经学的态度 (202)

二、经今古文学的第二次论争与最高统治者 “兼而存之”的政策	(206)
三、重建统治思想的白虎观经学会议	(211)
四、作为“国宪”的《白虎通》及其保守的理论 体系	(214)
第六章 东汉后期的统治危机及《公羊》学家何休改革 时政的主张	(225)
一、东汉后期的统治危机及经学家的思想 动向	(225)
二、何休对日益衰落的《春秋公羊》学的整顿 和鼓吹	(280)
三、体现在《公羊解诂》中的何休改革时政的 主张	(235)
第七章 东汉后期调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郑玄 综合学派的形成	(242)
一、经学中综合学派产生的历史条件	(242)
二、作为综合学派先驱阶段的贾逵、马融的 经学	(244)
三、综合学派最终形成的标志——郑玄的 经学	(246)
四、以“礼”遍注群经是郑玄综合学派的显著 特点	(250)
五、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253)
 表一：两汉经学传授表	 (256)
表二：两汉经学家著述要目一览表	(272)

第一章 先秦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 对早期儒家学说的继承和改造

一、春秋后期由孔子创立的在思想体系 上具有二重性的早期儒家学派

严格说来，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经学，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但世界万事万物总有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经学也不例外。经学并非西汉初年突然冒出来的。春秋后期由孔子创立的早期儒家学说，是日后经学的基础和先导。没有早期儒学，也就不会有西汉以后的经学。

早期儒学是春秋后期社会大变革的产物

班固《汉书·艺文志》释“儒”时说了下列一段话：“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明阴阳，顺教化，游文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段话对儒家作了定性的分析，诚然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是，以“宗师仲尼”释“儒”，失于偏颇，因为这是后起之义。事实是，“儒”比“儒家”来得古老。一般认为，最初的“儒”，是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职业就是替贵族人家相礼。相礼，自然显得温文尔雅，长于进退，所以古代的“儒”又可训为“柔”和“儒”。（《说文解字》）